



泰安党史资料

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990

17

泰安党史资料

总第17期

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

1990年6月

封面题字 武中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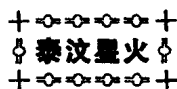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 柯大先

本刊编号：泰出字047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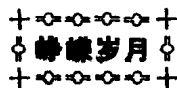
编 辑：《泰安党史资料》编辑部

印 刷：肥城县印刷厂
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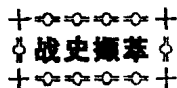
对鸢鸽楼庄党、团（少共）组织及其活动情况的回忆	王传斌（1）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

我的回忆.....	田勤耕(21)
在艰苦的岁月中	

——忆鲁中第三、四军分区的建立与卫生工作片断

.....	朱 杰 杨在春（35）
火线修械所.....	朱乐山（54）
奋战在艰苦的年代里	
——难忘的战斗生涯（四）.....	刘志太（70）
三上徂徕山.....	刘少岱（81）
忆鲁中干部子弟小学.....	刘国祥（85）
虎口除叛徒.....	李玺堂（98）



莱芜战役.....	陈士渠(100)
布山战斗中的公安保卫队.....	李鲁村(119)
杨家林歼灭战.....	张政德(122)

+ ○ ○ ○ ○ ○ +
 ♡ 党史与人物 ♡
 + ○ ○ ○ ○ ○ +

夏天庚同志与泰宁抗日自治政权·····	张 彬 (124)
范明枢在我家·····	张继军 (128)
对大哥李正华几次战斗的回忆·····	李连奎 (134)
忆革命烈士王振忠同志·····	桑毅修 孙岱远
张晶轩 曲子玉 王振鲁 崔健文 周长进 (136)	

+ ○ ○ ○ ○ ○ +
 ♡ 历史文献 ♡
 + ○ ○ ○ ○ ○ +

(泰山)地委对反资敌斗争的决定(1943.3.8)·····	(15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+ ○ ○ ○ ○ ○ +
 ♡ 支前纪事 ♡
 + ○ ○ ○ ○ ○ +

莱芜县担架团支援淮海战役的片断回忆	高镇如 王宪曾 (153)
泰山区参加淮海战役第一期民工团的回忆·····	吕应杰 (161)
过江的泰西民工团·····	宋元明整理 (16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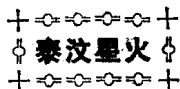
+ ○ ○ ○ ○ ○ +
 ♡ 来函选登 ♡
 + ○ ○ ○ ○ ○ +

翟汝建其人及泰山军分区安全脱险的时间考·····	马洪新 (172)
关于自卫团五大队一中队的几个数字·····	张敬堂 (175)
关于徂徕山起义的几封信	

·····余 琳 范天恩 马树梅 左宏奇 高树声 (176)	
关于泰西地委及群众团体的一些任职情况·····	胡晓民 (184)
1940年泰西群团情况·····	张伯源 (186)

+ ○ ○ ○ ○ ○ +
 ♡ 党史研究 ♡
 + ○ ○ ○ ○ ○ +

编写地方党史大事记的几点探索·····	王德收 (188)
本期责任编辑:黄文勃 刘汉勤 朱彦波	



泰汶星火

对鹁鸽楼庄党、团（少共） 组织及其活动情况的回忆

王传斌

关于莱芜鹁鸽楼庄党组织及其活动情况，在不少老同志的回忆中已有叙述。由于刘仲莹在鹁鸽楼庄直接领导着党的工作的开展，所以对鹁鸽楼庄党、团（少共）组织的活动情况，很有必要做系统地回忆、整理。我也想把所知道的情况记录下来。但是，事情已经过去50多年了，又无书面文字可查考，仅凭记忆确有困难，所以这项工作就停了下来。直到1986年冬我回国后，看到了许多老同志写的对莱芜党史的回忆，很受启发。我找出了1944年夏季我在中共沂南县委整风学习后期写的一份“整风自我反省”（因敌人扫荡未完稿）材料，这是一份几经周折，有幸保存下来的材料。以这份材料中所记的年、月、日，我村党、团（少共）组织的活动情况等为线索，还有若干次回家乡和到莱芜县委与有关同志的交谈，以及我平时所零星回忆记下来的材料，综合后，试叙述如下。不确切及错误之处，请老同志们纠正。

一、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

鹁鸽楼庄的党组织是刘仲莹（即刘盛玉）领导建立的，黄仲华同志是最早入党的，随后逐渐发展起来，并积极开展活动进行斗争，形成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。其主要工作及活动情况仅我

所知道的作如下记述：

（1）进行宣传，这是一项经常的重要任务。主要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得见、感觉得到的切身利益方面去进行舆论宣传。如“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不算完事，他还要进关，咱山东也快让日本人占了”，“蒋介石不抵抗，咱们可不能当亡国奴啊！”当时，莱芜有不少人因穷困所迫闯关东、下高丽（朝鲜），对日本人侵占后人民的悲惨遭遇早就知道一些，易于接受这些宣传。结合国民党政府强行以纸币兑换银元，日货倾销市场等事实，进而感到“这样下去穷人没有活路了！不能等着死啊！”还利用莱芜每年有不少人“下茶山（即到安徽、河南一带）时，看到“南边”有大股军队，人称“红军”，对穷人好，那里的穷人不受苦了等等进行客观地传播消息，收到较好效果。当时，我们既要宣传，还得注意不能暴露自己，又不要把人家吓跑了。这些方法不是开始就会的，是一步步学会的。刘仲莹除指导如何改进宣传方法外，他还从一开始就注意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宣传工作，以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，去联络、宣传他的同学、好友，其中有不少人是小学教师。他们中的不少人具有进步思想，正为国家、为人民担忧，想方设法要去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，因此，往往是一说即通，志同道合，有些人很快地参加到党内来。所以，莱芜党组织发展较快，影响也在迅速扩大。在当时，农村文化落后，这些“先生们”的言行是有相当影响作用的。

再是文字上的宣传，如张贴标语和油印宣传品。约在1933年初秋，我看到刘仲莹在他家东屋里，用一支带铁尖的笔，在一张透明的腊纸上，垫在一块铁板上铮铮作响地刻着宣传品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新鲜玩意儿。他告诉我说这叫腊纸、铁笔和刻字钢板。这时我已参加了“少共”，时常在他那里，他也不回避。当刻完后，他便叫我帮他掀纸、整理。我只管弄纸，没有他的允许，我是不敢拿起来看的，这是我加入“少共”后他告诉我的纪

律：没有经过允许的不能看，大人说话听后不许对外人说。在我翻纸时，看到腊纸上的字是竖着写的，有字写得大一些的标题“……为敬告……”，“莱芜”等字样。印完后他便将这些纸张藏起来，并再次嘱咐我：这件事只许你自己知道，可不能说出去。当时张贴标语多派勇敢机智的同志在夜间到较远的集镇上张贴，这些同志都是农民，白天干农活时就支撑不住了，有的因此而受到父兄的责骂和不满。刘立三在富农朱尔贵家当长工，第二年便被辞退了，这可能是重要原因。还有马振川、刘子杨、刘子陵等都去贴过标语、传单。这些我原来不知道，是刘立三和其他几位贴过标语的同志谈到有一次在某村贴标语时，差点被狗咬住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去贴标语，夜间下着雨，路滑难走，幸好我们穿着“水袜子”没有跌倒（水袜子是一种低劣的胶底半高鞋，富农朱尔贵每年夏季给长工买一双这种鞋），所以我至今还深记此事。

（2）党内教育、上党课。多是结合党小组会、进行党性教育。当时，在刘仲莹家的小东屋里，经常聚集着一些党员，他则借机讲讲在上海等地的见闻，城市工人的革命情况，还有报纸上的消息等等，使大家听听后便觉得我们干的事情是对的，也感到很新鲜。他还用历史故事或古代成语来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刘仲莹对常在他那里的同志们说：中国有句古语说：“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豹过留皮”，这才算好样的，不是白白的过日子，才算得上人生一世！那天晚上，他好像有点激动，对着大家也指着我说：记住了没有？这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944年夏天我所写的“整风自我反省”中对他这几句话的反省认识是“教育我革命要斗争，死了算什么！激发了我的革命斗志”。当然，他的这几句话并不能完整表达对共产党员的要求，但是，在50年前的那个年代说这些话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刘仲莹还自编自写了党员教材。我是在他的小东屋里看到他在几张毛边纸的中间，夹上几张复写纸。我帮他用纸捻子装订成

小学生课本那么大。每页上字不多，写的也大些，是上下竖着写的。每页都标明“第×课”，大概共有十几课，课本不厚。第一课就是：“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是由工人、农民××（中间有几个字记不清楚）组织起来的。”其他还有什么“组织”、“铁的”等等，不懂是什么意思。有一天晚上，刘立三通知我到张永深家去，我去后见到马振川、鹿秀岩、窦子芳、朱尔顺等都在那里，黄仲华对第一课的内容进行解释后，大家讨论，发言的很多，我没有发言。

（3）为劳苦大众办好事，为穷人撑腰争情理。当时，在农村一些贫富之间的争议中，多是以穷人吃亏而结束。遇到这类事情，党组织则想方设法为穷人说话、出主意，有时刘仲莹也出面调解、说理。在党内我们还讨论过怎样才能使穷人得到实际好处。以后就发生了夏季“割麦穗头”、秋季“地里打豆子”等与富户做斗争的行动。这些行动也是分人区别对待的，对压迫穷人厉害的，表现蛮横的，就对他不客气；对比较开明的，则不采取此类行动。此事震动很大，那些财主虽然怀恨在心，但也毫无办法。

（4）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发展（其中还有女党员，具体数字不详），建立和直接领导“少共”组织的活动。当时，还曾有过“红军之友社”的事，这是刘仲莹、黄仲华在一起谈及的，并说因我父亲太穷苦，没有钱就不要捐助了等等。以后，再未听到说起此事。

（5）想方设法弄到枪支，武装起来。这是经常在一起讨论的，有一段时间议论得很多。这是从1933年莱芜党组织遭到第一次破坏时而感觉到的。当时，国民党警察到鹁鸽楼庄逮捕窦子顺（秉坤、光宁）未成。我们觉得没有枪支，如果敌人再来逮人，只能躲藏，总得想办法。在刘仲莹家的小东屋里，一些同志就议论：“‘南边’的队伍什么时候能打到咱这儿？咱们也学‘南

边‘拉起队伍来干不行吗？”这事刘立三等议论的最为激烈。刘仲莹也和大家一起议论，但他认为咱这里和“南边”不一样，不能盲目地说干就干。但是，大家对想法搞到枪支总不甘心，有的说“下团丁（指国民党区级的卫兵）的枪吧”，有的说“咱们买二八盒子炮（指匣子枪），但太贵了，一支就要好几百块现大洋到那里弄这许多钱呢？”当时，仲莹家的好地已卖了不少，即使把地全卖光了，也买不了几支枪。大家为拿不出好主意而着急。

综观鹁鸽楼庄党组织的活动是多方面的，斗争也很激烈。党员因对这个现实社会不满，有急于起来改变现状的情绪，有些活动则不注意隐蔽。如有段时间里，刘仲莹在晚上领着我们一群孩子在大街上高唱国际歌，并和我们解释“英特纳雄耐尔”是外国话，就是共产主义的意思等等。当时我们村约有一百多户人家，不到500人口，党员虽是秘密的，但国民党县警察局来捕甯子顺时，哪些人躲藏、逃避，村里好多人的心里是明白的，所以秘密是有一定条件的，根本在于群众支持。我们在斗争的同时也注意团结、影响村中一些有一定威望、地位的人物，争取他们的支持和谅解，强调我们是为国为民。这多由刘仲莹亲自去做工作，收效较好。

在回顾上述活动中，可以看到刘仲莹所起的重要决定性的作用，有些情况将另文补充，这里不再详述。黄仲华同志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，他和刘仲莹一起为党的事业奔忙。他家境贫苦，白天干农活、织布，而党的活动多在晚上进行，困难很多。在叛徒、敌人的几次破坏和严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，他始终负责领导党、团（少共）组织坚持活动和斗争。他很尊重刘仲莹，也从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和领导艺术。仲莹同志外出后，整个担子就落在他身上。对一些重大问题，他都认真抓紧做好。1937年腊月初二晚上，领导我村党员勇敢地集合在我村南山（云台山）和尚涧，

成为徂徕山起义的一支的重要力量。

在几年的活动中，党、团组织得到了锻炼和提高，一批骨干力量成长起来。有些党员，如张永泉则很少露面，少为人知，还有些女党员也是这样。有的党员，如鹿秀岩，他为人机警、走南闯北、善于应付，他为党的交通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总之，鹁鸽楼党组织有着刘仲莹这样的带头人，一开始基础打得好，为劳苦大众办好事，所以在斗争中逐渐发展、壮大，形成了一股重要的革命力量。

二、“少共”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

鹁鸽楼庄党组织于1933年夏初，直接领导建立了“中国共产主义童子团”，简称“少共”。意即参加组织者即是少年共产党人。这年夏历闰五月十九日晚，由刘仲莹、黄仲华介绍批准我参加“少共”。这个组织的全称，简称，都是那天晚上刘仲莹告诉我的。他还对我说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有共产党，领导人是德意志的马克思和俄罗斯的列宁等等。刘仲莹还和我讲了一些历史上农民起义，如水泊梁山等英雄故事等，一个多月后，他直接问我：咱们这里也象“南边”那样干（指南方红军），你敢不敢？我记得我说：“你们干我就干！”刘仲莹是我心中敬佩的人物。过了几天，我即被批准参加“少共”。党组织直接领导建立了“少共”，“少共”的活动、工作、组织生活等都是按照党组织的活动要求来进行。“少共”有严密的组织纪律，吸收新的成员需有二人介绍，经小组讨论，报党支部批准，个别履行加入组织的手续。组员必须参加组织活动，服从领导，努力完成任务并按月交纳组织费。当时规定每月缴大铜子（二十文）一枚。我家境贫寒，没有钱的来源，我就把每年春节拜年或平时为人干零工得来的钱存起来，缴纳组织费。

“少共”组织的一切活动、工作等均是由党员直接领导进

行，先是刘立三，后是张永深，以后我年龄大些，也学会了怎样开会，布置任务等，即由我任组长，但党员同志仍来参加会议。了解情况，指导工作。组织生活按时召开，且认真讨论，规定两“集”（十天）一次。记得第一次小组会有：周茂山（抗战期间全家逃荒去关东，因鼠疫而死）、刘子裕（抗战期间到大连造船厂）和我共三人。小组会有一套固定程序，如，组长宣布开会，推选会议主席，形势报告（当时也说不出多少形势，多是听来的新闻或南方红军的事），汇报讨论工作，自我批评，今后任务及临时动议等等。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形式主义，但当时必须逐项进行，缺一不可，所以每次会都拖得很长。以后对组织生活熟悉了，就不那么呆板了。开会地点都在村外，夏天找通风凉快的地方，冬天多在村东大土崖下，可避风寒。

如何进行宣传工作，这是我们经常讨论分析的问题，最初都不会干。刘立三同志就把党员进行宣传的内容、方法等告诉我们，这样去做果然有效，通过我们小孩子去说不易为人怀疑，还可听到一些反映、议论，在小组会上汇报时，刘立三、张永海都说过要一面宣传，一面注意反映，党组织对此很重视。

再是监视坏人。国民党警察来我村逮捕窦子顺老师的现实教育了大家，所以对这一任务都很重视，发现有什么可疑之事之人就及时向党员报告，每次会上都要讨论一番。

做党的交通员，这是符合我们年龄特点的任务。我们年纪小，行动自由易隐蔽。主要是刘仲莹有时将信件交我们送，多是去邻村。记得有亚上庄的刘莱大、牛王泉的鹿省三、降寇庄的马子成和秦云川、鲁西镇的“文成书局”负责人任瑞先（王其人）、曹春耕等。其他还去过泉河、黎沟等村，姓名已记不清了。对送信的要求很严，如务必送到，不能丢失，保守秘密，不许随便对人等等。这些任务我们都完成得很好。

积极发展组织，扩大队伍。几年中就发展了张正芳（后转

党，在我村任支部书记，文革中去世）、窦兆让（他没有编入我组，现在浙江省工作），都在学校读书，我和他们分别谈话，按规定发展的。另外，还和吕其富谈妥，经小组讨论同意。但他跟他奶奶说，他奶奶很害怕说：那是造反呀，抓了去要杀头的！可不能干。”因此他没有参加。还有一个叫刘圣信，他是随父母闯关东在“九一八”以后回来，与我在一起念书。他愿意参加组织，但由于工作没抓紧而搁下了（该同志很早参军，在作战中牺牲）。

1933年和1935年，叛徒、国民党对莱芜党组织的两次破坏，对“少共”组织也是现实而深刻的教育和考验。组员们对什么叫叛徒？他的危害性都有了认识，更加仇恨叛徒和国民党政权，都表示要坚决干下去，没有表示惧怕而不干的。党组织对“少共”的工作、活动一直抓得很紧，对重大政治问题都及时向“少共”组员传达。1936年“双十二”事变的消息传来后，组员们互相转告，认为这回把老蒋抓住了，非杀了他不可！为我们的同志报仇！不久，黄仲华专门召集会议，传达上级指示，说明为什么不杀蒋介石的道理，还说了几个什么“条件”。“少共”都知道服从上级决定这个组织原则，大家都表示同意，但心里总觉得好不容易把老蒋抓到手，又放了，太便宜他了！

从1933年到1937年近五年的时间里，我们这些“少共”成员，已从十二、三岁的孩子，成为十六、七岁的青年了。“少共”的名称没有改变，但任务增加，也有些活动经验了，组员们都认为现在是“少共”，年龄大些就是共产党员了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不久的一天晚上，在“少共”的一次小组会议上，黄仲华特来参加会（那天晚上任瑞先同志也来了，与仲华说了几句话就走了），他除了谈抗日形势外，又接着宣布说：县委经过讨论决定王传斌转为正式党员。这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，更说明着“少共”的性质，是党领导的秘密地下组织，决非一般群众组

织。因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公开组织。从此，由我直接领导“少共”小组。其他组员也先后成为党员。1948年秋，我第一次回家乡，曾问过张正芳是怎样转的党？他说你们都上山打游击去了，我们在家的就联系上干了起来，没有人与我说转党的事，我当党支部书记已有好几年了。

“少共”组织按照党的指示，积极组织抗日武装起义。这一段的工作有的是“少共”组织自己活动，有些活动则和党员一同开会。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步步加紧准备。这时，和我们同年龄的青年人中有“卖兵”的（替地主当兵），“少共”即告诉组员：决不能去干那个，咱们自己准备干。直到日本人打到莱芜，继而南下蒙阴、新泰县城时，按照党的统一部署，于腊月初二晚上，我到南山和尚洞集合起义，还有一些“少共”组员也上了山。

三、经受考验，继续坚持斗争

叛徒、国民党特务对鹁鸽楼党组织的破坏，较大的有两次，第一次是1933年夏天，国民党警察、特务到鹁鸽楼庄小学逮捕窦子顺（秉坤、光宇）老师。窦老师是本村人，原在莱芜县立乡村师范读书，1933年回到家乡任小学教师。我村小学设备很简陋，学生和老师都在一间大北屋里，有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一张破床供老师用，另有南面一大间供上课用。窦老师教书认真，讲解清楚，注意启发学生，有时还教唱歌和绘画。他对学生要求很严，因他是本村人，知道每个人的小名，谁犯了毛病，他叫着谁的小名批评。他领着学生把堆积在学校院子里若干年的垃圾清理掉，并翻好土，让学生各自从家中拿来各种花种种上，使院子四周花红草绿，同学们感到很新鲜。乡亲们和学生家长为本庄出了个好老师，能把孩子们管教好而高兴。

自窦老师上任后，来学校找他的人多了，如刘仲莹、黄仲华等，外村知道名字的有任瑞先（王其人）、曹春耕等人。同学们

都以为窦老师在外上“洋学堂”，同窗好友多呢。在我参加“少共”后才稍微看出一点内中的意思来，如曹春耕是鲁西镇“文成书局”的伙计，他卖的笔墨纸张比别人便宜些，态度和善。他每次来校，窦老师和他特别亲热，两人谈起话来没有完。但当时并不知道窦老师从教书为掩护作党的联络工作。

这年阴历约在七月中、下旬的一个中午饭后，刘仲莹、黄仲华等九个人正在学校和窦老师说话，不知何故急忙都走了。这时突然进来了约有十几个国民党警察，每人都带有枪支，推着自行车（这在当时是很能吓唬人的）。他们进院后，也不进屋，都在院子里分散站着，好象在休息。其中一个头戴麦草辫礼帽，身穿白色略带黄的洋服，因天热敞着上衣，手拿纸扇，戴着眼镜，大摇大摆地走进屋来，旁若无人地坐在窦老师的椅子上，随手翻弄着桌子上的书籍和物品，还拉开两个从未上锁的抽屉，随意乱翻。我只觉得这人真不懂事，乱翻别人的东西，欺负窦老师为人和善。我在学校中年龄较大点，学校的习惯是应帮助老师烧水、沏茶、洗涮茶碗、招待客人。但这次和以往不同，窦老师一切都自己干，我曾几次想接过茶壶帮他一下，他都不让，手拿茶壶和茶碗屋里屋外地走动。我曾听到那个一直坐在椅子上不动的官员大概是说：“县××局长请你到县里去说说……”，窦老师仍是脚不停步地随口“嗯嗯”地答应着。一直站在屋门口的几个警察在太阳底下直冒汗。窦老师让他们进屋凉快一下，也不进去。至此，我还是没有弄明白真正原因。就在窦老师手拿茶壶到屋西头空场的转眼之间，只听到几个警察同声大叫：跑了人啦！此时我正在院子里等着开水，很吃惊地向西一看，窦老师已无踪影。警察们顿时混乱恼怒起来，大叫快追呀！抓住他！别叫他跑了！警察们很快追了出去，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国民党特务趁势拿了些窦老师的书籍、物品等赶紧跑了出去。同学们见此情一哄而散。同学们的桌子、凳子横七竖八，不少翻倒在地，真似一场大难以后的

景象！

我是最后离开学校的，趁机看了窦老师是怎样越墙而走的。从现场看，他是一个大步踏着斜依在屋西头矮墙叠放在一起的两扇“风门子”中间的一道横梁上，再一步是手扳着较矮的墙头，一下子翻越而过，逃脱了敌人的追捕。这两扇风门子每年夏初卸下来后，都是照例斜放在西矮墙下，谁料到它竟成了救命的阶梯。土墙头上有着明显踏碎的痕迹。这是我参加“少共”后第一次所看到敌人的凶狠和我党员的勇敢和机智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教育。

窦老师越墙以后的情况，据以后党内外较为一致的说法是：他越墙过去正是他家的柴禾园和破屋子，他随即向北，这里住着若干户人家，经过若干矮墙、小夹道后，在刘永兴家（他儿媳张美玲是党员）猪栏顶的家具、破草中隐藏了起来。当天下午，敌人全部离村而去，待到夜深人静时，刘永兴设法和窦老师的父亲联系上，弄了些盘费、衣物，于当夜离乡远奔他处。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窦子顺老师。

窦老师这次安全脱险，是得到群众的诚心帮助。那天窦老师翻墙而过，一些乘凉纳鞋底의妇女不知出了什么事，紧接着国民党特务也翻墙而来，严厉地追问跑过来的人那里去了，要说实话等等。年轻媳妇们吓得张不开口，赶紧跑回家，有位刘老太太（我们叫她三老奶奶，靠要饭为生）没来得及走，特务们问她时，她装聋作哑地说没有看见啊，指东划西地向南指着叫特务们向南去找。敌人当然找不到了。特务们又到窦老师和刘仲莹家中威胁要人，并乱翻了一通，拿了些书籍、物品走了。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计划落空了。事后知道刘仲莹、黄仲华等出校后，紧急通知了一些党员迅速离村躲避。这次事件后不久，刘仲莹等人就回来了，党、团（少共）组织很快又活动起来。

第二次是1935年秋季，国民党警察、特务身穿便衣，突然在

一个下午闯到鹁鸽楼庄，分头直奔刘仲莹、窦秉坤两家捕人，严厉追问人的去向并要家属交出人来。他们胡乱翻腾了住处，又拿了一些书籍、物品走了。这是刘伯戈、周灿林（茂森）两个叛徒向国民党特务提供的名单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特务机关急忙派人到莱芜县，妄想乘我不备一网打尽。国民党特务到冶河子村逮捕潘德和同志，这位同志长得身高力大，寻机将两个特务打翻在地，拔腿就跑，特务们追赶也未能追上。他没有只顾个人逃脱，而是边跑边到有党员的村子紧急通知消息，这些党员闻讯后急忙再到各村分别四下通知，并特别注意通知莱芜县、区委和一些知名的同志，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紧张地、通向四面八方的地下交通网，与敌人竞走而力争抢在前面。由于潘德和同志的及时通知，凡是得到消息的同志都迅速转移，避免了一次严重损失。刘仲莹、黄仲华等同志接到消息后，立即紧急通知我村其他党员迅速转移，结果敌人来我村未能捕到一个人。

国民党特务机关因未抓到一个人而不甘心，时常派些特务装扮成做生意，走亲戚或过路的人，混进村里探听消息。我村的群众没有一个人和他们说实话。记得当时形容这些人是：做买卖的不识秤，走亲戚的不认门。这样闹了一段时间，以后还是不时有“情况”。党组织已完全暴露。为保存力量，党员便分散隐蔽，离开家乡。刘仲莹走了，到何处去不知道。能够弄到盘费的刘成先、王瑞坤等人到大连去了，刘立三、张永深等临时到博山干苦力，鹿秀岩到章丘做小生意，马振川、刘子陵、子芳等也外出了一段时间，黄仲华外出一段时间后，便又回到村中，可能是因工作需要。

1936年春天后，形势不那么紧张了，外出的同志陆续回来了，刘仲莹也回来了，大家很高兴。党、团组织又活动起来。敌人接连两次的破坏，使同志们警惕性提高了，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，没有一个被吓倒或灰心丧气的。小组会上常常研究怎样对付